

圖書館學概論[†]

—圖書館服務的基本要素—

Jesse H. Shera 著

鄭 肇 陞 譯*

「一個人所學，有許多得自書本，更多得自教師，
而最大的部分却得自學生。」

謹以此書

獻給我三十年來的學生。

傑西·薛拉 (Jesse Hauk Shera 1903—1982) 為美國著名的圖書館教育家，也是當代美國圖書館史、圖書分類、和文獻處理等方面的權威。薛拉出生於俄亥俄州牛津鎮 (Oxford, Ohio)，1925年以優秀成績畢業於俄亥俄州的邁阿密大學 (Miami University, Ohio)，主修英文。1927年得耶魯大學的英文碩士，他本有意於教書，但適值經濟不景氣，教職難求，就同邁阿密大學圖書館做事，一直到1940年轉職到美國國會圖書館。1944年得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博士，隨即出任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副館長之職。1952年接長西部儲備大學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圖書館學系，一直到1970年退休止。退休後仍從事寫作、演講，於1982年去世。

薛拉主張圖書館學的研究，必須從社會學、人類學、和科學等方面來探討，而不能把圖書館做孤立的研究。他認為圖書館員是促進人類與圖書兩者溝通最古老最有效的媒介。他的著作頗豐，綜合起來可分為五大類：第一類屬社會和文化

† Shera, Jesse H.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Basic Elements of Library Service*. Littleton, Colorado: Libraries Unlimited, inc. 1976.

* 譯者現服務於美國東卡羅萊納大學健康科學圖書館。

的研究，即探討圖書館與其社會文化環境之關係；第二類屬歷史研究，研究美國圖書館歷史，兼及美國文化史；第三類屬圖書雜誌，他認為圖書雜誌是傳達知識和消息的技術，同時也是一項社會行為，有其動機、過程、和責任；第四類是資訊管理機械化之探討，研究利用最新科學技術來處理圖書資訊，來促進人類知識的傳播；第五類是圖書館教育，檢討圖書館教育的本質，重視通才教育對培養良好圖書館員的重要性。

薛拉專書和論文頗多，無法一一列舉。此文係譯自他 1976 年出版的「圖書館學概論：圖書館服務的基本要素」一書，藉以明瞭他思想的一般，並表悼念之意。

序 言

著名的物理學家波耳 (Niels Bohr)，常常告訴他的學生：「我說的每一段話，你們都應該把它當做一個問題來思考。」史考特·布克南 (Scott Buchanan) 也經常問聖約翰學院的畢業生：「你，好嗎？」「你是否相信和信賴你的智力，那份永不休止的天生力量？當你生活和學習的時候，是否覺察到那份力量的作用？……在你的生命中，不論是進入聖約翰學院之前，離開之後，或在校期間，是否已成為自己的導師？你是否已經覺察到自己過去、現在一直是自己的導師？通才教育的終極目標是自由的心智，而自由心智須是自己的導師。知性自由之始，在於一個人能和蘇格拉底一樣，說自己什麼都不懂，但是又續道：我知道自己不懂的是什麼。在此我要問：你知道什麼是你不懂的？什麼是你應該知道的？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而謙遜，你就是自己的導師了，你會選定自己的課題，成為自己最好的批評家。」①

這些是人文學者的問題，尤其和圖書館員息息相關，因為圖書館學儘管對科學的運用日益增加，和社會科學的關係益趨密切，本質上仍是人文學的。它屬於人文學，因為它基本上是有關人類心智和人類經驗紀錄兩者之間的那份撲朔迷離的關係。圖書館學可以是一門社會科學，因為圖書館這種制度是社會的產物，它的目標在於幫助個人瞭解自己和他所處的世界，以達到社會的進步。不過圖書館也和人這個理性動物有相當的關係，因此它主要仍是一種人文事業。各門學科之間的傳統界線正逐步崩潰，有些地方幾乎是消除了；圖書館學在其技術和服務方面也漸漸接近社會和自然科學。不過我們還是要記得圖書館的人文根源，否則，過份偏重科學技術和行為主義者的社會活動，可能會使我們忘却個人和他的需求，以及其中所蘊含的人文價值。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成立不久，皮爾斯·巴特樂 (Pierce Butler) 便着手寫他的圖書館學入門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這本書，企圖說服圖書館同業們在處理圖書館問題上要「

更科學化」。在當時，這種警告是需要的。但是他從來沒有忘記圖書館的人文根本，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後，他以告誡他們「該死的，太科學化了。」來結束。兩次他都說得對。

我無意貶低視圖書館為社會公器的重要性，我也清楚科學對圖書館的改進所帶來的好處，但我們不要忘記了人文的價值。許多世紀以來，它塑造了圖書館，指示圖書館方向，並建立了我們今日所知的偉大珍藏。圖書館是書，也是人，如此說來，它是一種人文事業。以下數頁將提出許多觀點，我願意奉勸諸位閱讀的時候，心底永遠存著「為什麼」。你必須學著做自己的導師。

這是一本介紹性的書，目的在為那些有意於圖書館事業的初學者提供一個入門。不過它也是一本私人的書，這是必然的，因為沒有任何兩個人能以相同的氣質，從相同的角度，看同一件事。我邀請了別人協助某些篇章，試圖擴大大書的領域。但是這些幫忙的人，也同樣的，在他們的撰寫中帶來各自的重點和偏好。絕對的真理和客觀是不可得的，不過你我仍須永遠努力追尋他們。

這本書無意做為圖書館的哲學體系，而旨在論證圖書館事業的深廣和豐富。對圖書館員而言，沒有任何知識或興趣是見外陌生的。一般性或專門性、藝術、人文、和科學等都共聚一架。社會為適應其基本需要而創立圖書館。阿其坡·麥可力許（Archibald MacLeish）說過圖書館屹立以「抗拒黑暗」，是宇宙性的證言，肯定人類經驗的偉大紀錄仍然活著，並且對我們深具意義，不僅是對個人，而且是對總體。同時，這些紀錄應該供所有需要並能使用它們的人自由擇取。

「告訴我，爸爸，你為什麼不像薩克雷（Thackeray）先生一樣子寫呢？」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一位孩子據說曾這樣問他。對這個問題，皮克威克文件（Pickwick Papers）的作者回答道：「是啊，為什麼不呢？」不管這個故事是真是假，每當我翻閱麥可力許卓越的圖書館學論文集護道勇士（Champion of a Cause）^②時，總要想起它。我常常讀這一本書，每一個圖書館員都應該讀這一本書，它以抒情流暢的散文表達出非常豐富的觀念和灼見。

本書的目的，不是介紹，更非樹立任何圖書館哲學，或提出圖書館現狀摘要，而是提出一些見解，討論什麼是圖書館學，以及它對有志從事此項事業的人提供了什麼機會。至於是不是達到這個目的，就有待我所謂的林瀉兄弟會（Fraternity of the Linnei）那些眼光犀利的評論家來品評了。但是如果你「把每一段話當成問題來思考」，如果它能幫助你「相信並信賴你的智力」，如果它能在你生活和學習當中，促進你辨識內心那份力量的活動，那麼寫這本書的工夫就沒白費了。「你，好嗎？」

附註：

- ① Scott Buchanan, *Embers of the World; Conversations with Scott Buchanan*, edited by Harris Wofford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1973), pp. 1-2.

- ② Archibald MacLeish, *Champion of a Cause*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71).

壹、溯自古老的閃莫

「煉獄熾熱，你們是否懷疑過理由安在？」盧索·史密斯（J. Russell Smith）以這個巧妙的問題開始他有名的北美地理課。「但是」，他續道，「並非所有的地獄都是熾熱的。在基督教傳入以前，斯堪地挪維亞人心中，地獄是一片永不解凍的冰天雪地。對古挪威人來說，冰冷令人陰鬱不快，而熾熱的地獄未免太舒服了，不像個地獄。」①當然，這位卓越的哥倫比亞大學地理學家，將一個文化的神話和傳說，以及其發源地的自然環境兩者之間的關係誇張了。社會革新，並不是「宇宙神的額頭上」冒出來的，而是深植於一個文化裏，由實踐和信仰中衍變而來。圖書館是一種社會產物，它的產生，是由於人類經驗的累積過於龐大，超過了人類記憶能力的範圍，以致經驗的保存，再也不能僅憑傳統的口頭傳述流傳下來。

在本章諸節中當可窺見，長久以來，各時代均擁有並利用當代圖文記載的收藏，以保存並發揚它的知識習性和傳統價值。文化運動是文明歷史的經緯，它也是塑造圖書館的重要因素，它影響館藏的性質、組織和行政，以及圖書館服務的方式。從閃莫（Sumer）和奈納維（Nineveh）的粘土版以及古埃及的蘆草紙，經中世紀修道院簡陋的設備，早期學校的教科書蒐藏，直到現代的免費公共圖書館，圖書館歷經變換，每次變換，莫不受當代社會需要所影響。每遇社會理念有了重大變遷，圖書館就隨著變動。儘管有許多變換，但圖書館仍有其顯著的恆常性。這些恆常性使圖書館制度前後一貫。

遠古東方的曙光

圖書館的起源，隱藏在史前的朦朧中，而在最早的圖文記載裏，也只有片斷的粘土版可資借鑑。這些遺物也僅提供了些蛛絲馬跡而已。我們只能臆測在早期的文明中，紀錄的蒐集似屬存在。我們從歷史記載的知識觀點來衡量，這種推測尚合邏輯。

我們可以假定圖書館始於閃莫，因為它是今日文明的發源地，而「所有事物」似乎都從該地開始。但就現有可考的文獻而言，我們必須把眼光注意到早期的埃及和它的廟宇，以探討第一座圖書館。廟宇是埃及人的生活中心。古代的埃及，國家和教會一體，神權政治統治著人民。埃及文風頗盛，又早知種植紙草，紙

草爲當時通用的書寫工具。西西里島戴歐得羅素 (Diodorus of Sicily) 在記述古都希布如 (Thebes) 的遺跡時，曾提及一座圖書館，在其入口處刻有「靈魂之藥」。在卡納克 (Karnak) 尼羅河對岸，則發現了兩位父子圖書館員的墳墓，名爲瑪木 (Miamun)，他們在紀元前一千二百年雷姆西斯 (Ramses) 時代做事。這些墳墓顯示，圖書館員這個職位，可能就像古代埃及其他許多公職一樣，均屬世襲。卡納克圖書館現僅存遺蹟，它是在藝術和科學之神的管轄內，通稱「書屋」 (House of the Books)。而艾得弗 (Edfu) 的圖書館建築如今仍然屹立，通稱「古文書館」 (House of Papyrus)，雖其一度擁有的文獻已蕩然無存。在這個建築的牆壁之一，刻有館藏目錄，目錄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列有十二箱不同類別的資料，包括政府的行政及其功能；第二部分列有二十二箱資料的內容，全部關於魔術、神怪，以及當時的醫學和科學——例如：如何擊退黑暗和傾軋之神賽特 (Set)；星占；如何擊退鱈魚；如何防禦爬蟲和毒蛇；以及神秘古怪之書。古代埃及的紀錄得以流傳下來，得力於溫暖乾燥的氣候，以及宗教的信仰，宗教鼓勵人民將資料葬於墳內以供死者來世之用。而埃及蘆草紙，就是在最好的條件下，也很脆弱。因此，我們也許在巴比倫和亞述找到更多有關圖書館的情形，在那兒，他們書寫在粘土版上。

我們所知道的一座稍具規模的圖書館——根據幼發拉底河 (Euphrates) 和底格里斯河 (Tigris) 流域文化所遺留下來的資料——要遠溯到紀元前六百年。它是位於奈納維的皇家圖書館，由亞述王亞敘巴尼波 (King Assurbanipal) 承繼並大事擴充。它的豐富蒐藏，包括有關文法、詩詞、歷史、科學和宗教的著作，似乎使當時的許多圖書館會之失色。當時大量資料被運到皇宮，其中有許多資料當即由學者抄錄下來，抄完後又送回原處。據說它的蒐藏數以萬計。但當亞述帝國開始式微，粘土版時代亦告終止。隨著帝國的滅亡，我們得把眼光移到希臘。

希臘地理學家史特勞波 (Strabo) 寫道，就他所知，「亞底斯多德是蒐集圖書的第一人，他並教導埃及國王如何整理圖書館。」但我們須注意，史特勞波是在這位卓越的哲學家之後大約五百年才著述，因此他的話頗值懷疑。不過，希臘對埃及圖書館的發展影響的確很大，此點我們即將談及。

古代希臘羅馬的圖書館

世上最早的主要圖書館，就像最早的主要書寫文學，是希臘天才人物的產品，雖然在紀元前五世紀閱讀的人口很少。在紀元前五世紀以前，以及其後許多年，毫無疑問的，人民從流浪詩人和說書人口中求得傳統的知識。替公眾寫信和讀信的公共書家，以及送信的信差，便是當時的郵政系統。不過，到了紀元前五世紀末葉，希臘已不乏圖書。但要到亞里斯多德的時候，希臘世界才由口頭傳述方

式轉移到閱讀。

在五世紀「培力克利茲黃金時代」(Golden Age of Pericles) 雅典已有不少的私人藏書，而且毫無疑問的，有些私人藏書對當時的學者公開。雅典的第一所公共圖書館創建於紀元前三三〇年。它的創立，是在提供平民一個閱讀希臘偉大戲劇家真正作品的場所。伊斯奇勒斯 (Aeschylus)，索弗克里斯 (Sophocles)，和尤里披地斯 (Euripides) 等人的悲劇故事，極受歡迎，但一般平民却只能接觸到少數的錯誤本子。根據史學家玻利比亞斯 (Polybius) 的說法，雅典在紀元前三世紀已有許多公、私立圖書館，以致西西里的史家堤美阿斯 (Timaeus) 埋首在這些圖書館中達五十年之久。

古代希臘最重要的圖書館並不建於雅典，而在埃及。亞歷山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計劃在尼羅河入口處建造一座可媲美雅典的文化城，但他並未及目睹夢想的實現。雖然如此，亞歷山大 (Alexandria) 城在多祿莫 (Ptolemies) 王朝終究成為重要的文化中心。

多祿莫一世索托 (Ptolemy I Sotor, 367-783 B.C.) 在學者、政治家和政界人物迪米初亞斯 (Demetrius of Phalerom) 建議下，在亞歷山大城皇宮附近優雅的布魯丘 (Bruchium) 建造了一座美侖美奐的建築物。這個建築兼作博物館、圖書館和學術院之用。它不僅蒐藏圖書，並有動植物標本、手工藝品和藝術品。迪米初亞斯的計劃是在此建立亞里斯多德理想體系的學園，而通常也將圖書館的發展歸功於他。但維力蕭威爾 (H. J. de Vleeschauwer) 堅決辯護，他相信圖書館的原始，是東方精神和希臘精神等量，而「圖書館本身是從多祿莫和他對東方圖書館的遐思而衍生的。」因此，他認為圖書館是「多祿莫和迪米初亞斯的共同作品。兩人分別扮演了創始者和執行者的角色。」②

在多祿莫二世 (Ptolemy II) 時，亞歷山大圖書館達到巔峯狀態。多祿莫二世蒐集圖書的狂熱，令人驚訝。傳說每當商船泊港，便被查詢是否載有手稿，若遇有手稿，原件存放圖書館，而複本送還原主。多祿莫繳付保證金，從雅典借來政府保有的希臘戲劇家的劇本。然後他犧牲保證金，將原本留在亞歷山大，而以複本送還。亞歷山大不僅藏有希臘手稿，並有衣西歐匹亞 (Ethiopian)、波斯 (Persian)、希伯萊 (Hebrew)、北印度 (Hindi) 等地的圖書。學者們由皇家供給津貼，請來整理研究手稿，務求正確無誤。皇室全心全力旨在建立一所圖書館，它被稱為「遠古世界的榮耀」。圖書館蒐藏日增，乃在邱比特·素拉披斯 (Jupiter Serapis) 廟宇另建一館，雖則第一個圖書館仍屬首要，不幸的是，原館在西元前四十七年凱撒 (Julius Caesar) 征服亞歷山大城的巷戰中燬於戰火，素拉披斯圖書館乃成為主館。另一個傳說是，當凱撒的軍隊企圖將圖書館的圖書取走，亞歷山大城市民在港內放火燒船，以制止圖書出海，不幸船火延燒城市，禍及圖書館。埃及女王克利奧帕特拉 (Cleopatra) 為巴結奧卡斯達斯

· 凱撒 (Augustus Caesar)，將亞歷山大城的圖書送到巴格曼 (Pergamum) 。據說埃及曾有一段時期禁止蘆草紙出口，以防止其他圖書館蒐藏的發展。亞歷山大在那時代是最大的圖書館，當無疑問。具同樣規模圖書館的再現，是好幾個世紀以後的事。但究竟館藏多大——最高估計達一百萬件——則無人確知。關於它的毀滅，也有不同的說法。其中一個說法是亞歷山大城在公元三九一年錫奧菲拉斯 (Theophilus) 大主教命令下所毀。另一個說法是在公元六四六年回教徒入侵，阿莫爾 (Amr) 在奧曼 (Omar) 指示下焚毀該城。諸位在大學選過邏輯學概論，當記得典型的三段式論法的例子，它說明了「未周衍的中名辭」 (undistributed middle) 的謬論，斷定來自阿拉伯：

若亞歷山大圖書館藏有反對可蘭經的圖書
則它當毀。

若亞歷山大圖書館藏有符合可蘭經教義的
圖書，則屬多餘，當毀。

亞歷山大圖書館的圖書，既不違反，也不
符合可蘭經的教義。

是以，亞歷山大圖書館該毀。

詹姆·威斯特弗·湯姆遜 (James Westfall Thompson) 在其古代圖書館史論著中曾指出，早期的基督教徒和回教徒同樣狂熱，同具毀滅圖書館的能力。圖書館在幾世紀中，歷經蹂躪劫掠，圖書資料不是散離便是遺失。可以想像，多少遠古世界的智慧隨圖書館的淪亡而同歸於盡；豐富的希臘文化，失而不可復得。

在小亞細亞東北角的巴格曼，據說尤緬尼斯二世 (Eumenes II，紀元前一九七——一五八年) 在雅典女神 (Athena) 廟附近興建一座古代世界第二大的圖書館。此事是經由十九世紀考古學家的研究而得知。此項圖書館遺址的發現，有助於圖書館建築的鑑定，但對其所藏圖書，則僅止於推測而已。圖書館是兩層樓建築，前有柱廊，四房連接，並有空曠庭院。它顯示建築家心目中圖書館建築的古風。其典型時至今日仍然可見。根據傳說，當安東尼 (Anthony) 將館藏送給克利奧帕特拉以充實亞歷山大圖書館時，此館便告疾終。

羅馬文化衍自希臘。其實，早期的羅馬，幾乎是希臘世界的翻版。在最初五百年歷史中，羅馬沒有圖書館，且幾無信史。羅馬是講究實用的民族，他們關心農業和商業。羅馬歷史之開始被紀錄下來，約在它與迦太基第二次交戰之時 (公元前二一八——二〇一年)，它是用希臘文寫的，後來被譯為拉丁文。我們不應低估維基 (Vigil)、荷洛斯 (Horace)、歐維得 (Ovid) 等羅馬作家對世界文學的貢獻。許多年代以來，他們的拉丁著作，為英國和美國學童的必讀讀物。他們的著作頗豐。但就有關圖書館的事務而言，諸如館藏的蒐集和資料的管理而

言，羅馬人可說是毫無創意。

書籍之流入羅馬，始於馬其頓王伯修斯（Perseus）在普拿（Pudna）被羅馬軍人保勒斯（Lucius Aemilius Paullus）擊敗之後。隨著羅馬帝國疆域的擴張，圖書經常成了這些征服者的掠奪品。但利用這些羅馬蒐藏的，並非羅馬人，而是在羅馬的希臘人。在所有的戰利品中，最重要的要推亞里斯多德圖書館。它是素拉（Sulla）於第一次米瑞達提戰（Mithradatic War，紀元前八八——八五年）中征服雅典時接收過來的。

亞里斯多德圖書館的故事，根據史特勞波所述，為古代圖書館的盛衰隆替提供了很好的實例。當亞里斯多德逝世時，他的藏書遺留給他的得意門生析歐菲拉斯特斯（Theophrastus），他繼續恩師的逍遙學派達三十五年之久。當析歐菲拉斯特斯於西元前二八七年去世時，這批書又傳給他的學生乃勒斯（Nileus），他為防備這批書被運到巴格曼的圖書館，乃將它藏到地窖去。在那裏任其濡溼蟲蝕達一百五十年之久，直到紀元前一百年才為雅典富豪亞培里昆（Apellicon of Teos）所購得。新主人對這批在地窖裏受盡長期蹂躪的圖書加以整補。亞培里昆逝世不久，雅典即被素拉所佔，而這批瑰寶即被移到羅馬的皇宮。兩位圖書館員——泰蘭尼奧（Tyrannio）為西塞祿的好友，以及安若尼克斯（Andronicus of Rhodes）——繼續整補的工作，並且按照主題加以邏輯的排列。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因為史特勞波是泰蘭尼奧的學生。

古代羅馬的第一所「公共圖書館」是於紀元前三十七年由波利奧（Gaius Asinius Pollio）在里柏塔底斯宮（Atrium Libertatis）所創建。波利奧棄政從事藝術和文學，而成為史學家、戲劇家和演說家。年青時候，他曾是詩人柯特勒斯（Catullus）的朋友，並曾在雅典求學。他的圖書館的主要館藏來自素拉和藩洛（Varro）的圖書館，這種現象再度顯示了手稿如何輾轉易手，以及撰寫個別圖書館歷史的困難多端。然而，公共圖書館的觀念，並非來自波利奧，而是源自凱撒。雖則凱撒的理想，直到西元前三十三年奧卡斯達斯帝建造奧克塔維圖書館（Octavian Library）時才告實現。隨後又有西元前二十八年巴勒堤那圖書館（Bibliotheca Palatina）的成立。

羅馬最著名最具規模的圖書館，且是唯一一足與亞歷山大和巴格曼相提並論者，要推特雷強帝（Emperor Trajan，西元九八——一一七年）所建立的尤爾披亞那圖書館（Bibliotheca Ulpiana）。它由兩館組成，一館藏希臘圖書，另一館藏羅馬圖書，接連的幾位羅馬皇帝都曾興建圖書館。但許多圖書館，包括我們剛提及的那所圖書館，都被連綿的戰火所毀。有一點我們必須牢記，當時所謂的「公共」圖書館與今日所指略有不同。這些圖書館為學者而設，學者能利用這些寶藏，但一般平民則鮮能享用。其實在當時圖書館對平民也無好處。我們今日所想像的公共圖書館一直到十九世紀才出現於美國，當時正值教育普遍化的熱潮

方興未艾之際。

在拉丁文化黃金時期，即從紀元前一世紀到紀元一世紀末，羅馬擁有許多私人圖書館。這些圖書館都建立在富紳和政要們華麗的私有地。圖書的蒐集，以及和學者和藝術家的交往，成為威望和富貴的象徵。這些私人圖書館供學者隨時利用，而學者中有許多人也擁有私人圖書館。從西塞祿（Cicero）給亞提克斯（Atticus）的信件中，我們得知每當西塞祿新購一處別墅——他在義大利各地擁有十八處別墅——亞提克斯即差遣圖書館員去重修並整理圖書館，修補損壞的手稿，以及分類編目。許多羅馬的圖書館擁有數以千計的手稿，而幾乎每一處別墅或住處都有私立圖書館，圖書館數量龐多，羅馬法律乃明令圖書館得以世代相襲。羅馬帝國鼎盛時期，是由許多從前一度獨立的市鎮所組成，其中有許多市鎮仍保有他們的「公共圖書館」。四世紀初葉，根據地誌調查，當時羅馬的圖書館不下於二十八所。但到四世紀末葉，羅馬帝國開始式微，其統治者無法統治全國。最後一位拉丁史學家馬歇里奈斯（Marcellinus）寫道，圖書館「像墳墓般的封閉著」。

中世紀

羅馬帝國學術的衰微，在北方蠻族入侵前便已開始。早期狂熱的基督徒既痛恨又害怕古典文化，因為它們源於異教。到了第七世紀，希臘語言實際上已成了死的語言。古典文化，端賴非基督教的貴族們的維護，得以保存下來。到狂熱主義稍褪之際，教會終究培養出如卡西爾德洛斯（Cassiodorus）等人物。他和其他人士尊重知識，並促使修道院和天主教學校成為文化保存的場所。雖然在五世紀異教已消聲歛迹，知識界蒙受異教的貴族很大的恩澤。而宗教人物如阿波里納雷斯（Sidonius Apollinaris）及其他主教們，都是內心仁愛而獻身文化工作，以抗拒盲信狂熱。

學識移向東方

在東羅馬帝國，比起西羅馬帝國，從遠古時期過渡到中古時期的過程要順利些，而古典文化的挫敗也較輕微。在東方，對古典作家的偏見不那麼強照，一般人並未放棄對古典文化的興趣。當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於西元三三〇年建立，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就在波斯朴勒斯（Bosphorus）建立一所圖書館，但其蒐藏顯然不多。他似乎想把它塑造成一所優良的教會圖書館，而非帝國圖書館。其子及繼起的皇帝，則有意將它建成帝國圖書館。因此蒐藏的地位日顯重要，乃僱學者抄寫手稿，並力求保持藏書的水準。當圖書館於四七七年君士坦丁堡暴亂燬於戰火時，據稱館藏已超過十萬卷。奇諾皇帝（Emperor Zeno）繼立，重建圖書館，不過幾年，圖書館事業又告興隆。在此期間，有兩

個重要圖書館應該提及。一是學院圖書館，它持續了好幾個世紀，待其衰微，繼起的是君士坦丁堡大學圖書館。君士坦丁堡大學建於大約公元八五〇年，它為近東重要學術中心之一。它以及它的圖書館，在十一世紀的拜占庭文藝復興扮演了重要角色。君士坦丁堡第三所大圖書館要數大主教圖書館，大主教為東方教會名義上的領袖。在羅馬帝國內，尚有其他教會圖書館，其形式大多與索德（Abbot Theodore）在君士坦丁堡附近史徒廷（Studium）所建的修道院相似。大約在八二五年，索德在史徒廷建立了一所圖書館和寫字室，除了做為抄寫手稿之場所外，並為教育教士的學校；此乃為中世紀末期典型的修道院圖書館。

拜占庭的昌隆，在歷經內亂外患之餘，於十三世紀初葉終於進入尾聲。北方十字軍對圖書館和藝術品的破壞，估計超過二世紀後土耳其入侵所造成的損害。但君士坦丁堡在西方文化史上的意義非常重要，因為它在中世紀保存了許多希臘文學和藝術，這些文學和藝術在西羅馬帝國已蕩然無存。在公元一千二百年以前，手稿早已開始流入西方。在拜占庭式微之後，圖書成了西歐商業貿易的重要商品。因此，我們可以說文藝復興的基本是源自拜占庭。

但君士坦丁堡並不是中世紀惟一的東地中海地區文化中心。七世紀早期，回教勢力即已開始發展，伊斯蘭教橫掃大部份阿拉伯世界，從波斯一直到摩洛哥。歷經八個世紀，阿拉伯發展了它的軍事力量和文學教養，在保存文化知識的過程中，它與東方基督教同佔重要的地位。在阿拉伯世界中，知識的廣為傳播乃基於兩個重要因素。第一是標準阿拉伯語的形成，它適用於宗教與非宗教性的文學，結果是口頭傳述的溝通系統遞轉為書寫的文學體系。第二是約在西元八百年，紙由中國傳入回教世界。造紙技術很快的橫渡地中海，而約於九五〇年抵達西班牙。由口頭傳述到書寫文字的這項轉變，以及書寫資料的普遍發展，其重要性無可比擬。有史以來，書籍在一般人民心中，難得佔有像當時那樣崇高的地位。

在回教世界的中心大馬士革，烏米亞（Umayyid）王朝於第七世紀建立了一所皇家圖書館，它擁有大量的宗教和非宗教性著作：諸如有關法律、醫學和科學的手稿，有些是借來抄寫的，有些是蒐集得來。這些館藏並列為正式的國家檔案，雖然後來這些檔案又劃歸他處。再者，阿拉伯在波斯發現了一處希臘文化中心。它是景教徒於五世紀末被奇諾帝從敘利亞逐出後所建立，回教徒將這些古典作品翻譯成阿拉伯文。一直到西元七五〇年，大部分遺存的希臘文學也都被翻譯成阿拉伯文。

回教文化的鼎盛時期要推阿倍西（Abbasid）王朝，或稱哈利發（Caliphs，七五〇年到一一〇〇年）。哈利發將巴格達建設成回教世界的中心，而在一千零一夜中述及的統治者哈倫、亞爾、雷席（Harun el-Rashid）則在巴格達創建了一所優良的大學。尤其是在瑪木大帝（al-Mamun the Great，八一三——八三三）期間，大學及其圖書館和實驗室，都極為出色。當時特別注重科學，而

從西班牙一直到印度的圖書館，都在尋找適切有用的資料。巴格達的圖書館對學者公開，而不問他們的目的何在。一直到十世紀，這些圖書館乃為全回教世界圖書館的典型。地理學家耶克特·哈瑪威（Yakut al-Hamawi）於一二二八年到馬德里，他記述當時約有十二所圖書館對外開放，借書政策極為寬大，有一次他曾借了兩百本書。在同教世界裏，圖書館之多，圖書之充裕，為西方基督教世界所望塵莫及。回教勢力的影響，遠及西班牙，在哥多巴（Cordoba）、塞維（Seville）、托利多（Toledo）和其他西班牙城市，都設有圖書館和回教文化中心。

回教圖書館除了分佈極為普遍外，另一特色是它所反映的知識的廣闊性。雖則他們的成立是基於宗教的熱誠，但此並為妨礙或限制他們對學術的熱愛。他們寬大為懷，對於異教的觀點，比起當時相對的基督教，更為容忍大方。

就以今日圖書館的標準來衡量，回教時代的圖書館仍是出奇的現代化。理所當然，宗教仍居首要，但館藏却包括全部知識：詩、小說、醫藥、法律、天文、鍊金術、魔術、哲學、數學、演講、以及各種教科書和字帖。蒐藏以古抄本為主，雖也有草紙和羊皮紙的卷子。館藏似依學科排列，大圖書館則闢有專科圖書室。圖書編目在大的登記簿，依類排列，有達三十到四十卷者。書籍裝訂良好，書法講究，並有飾字飾畫，在富人的私家圖書館，常能找到精湛的本子。這些圖書館通常對學者開放。

不幸的是，回教圖書館也覆蹈先前在地中海地區的圖書館的同樣命運。不僅遭到戰火的蹂躪，而且在十二世紀以後，人類追求知識的興趣降低，雖則在北非和西班牙，學術研究仍延續了兩個世紀。這些重大的損失，都要歸咎於十一到十三世紀從北方下來的基督教十字軍。在敘利亞、巴勒斯坦、和部分北非，基督教徒對圖書館之破壞，就如同幾百年前入侵義大利的野蠻游牧民族一般。蒙古人在成吉思汗領導下於十三世紀入侵，圖書館亦未能逃脫肆掠之惡運。雖然蒙古人統治不長（一二六〇年即被逐退），但流禍所及，圖書館事業未嘗復元。十四世紀初葉，在巴格達曾有企圖恢復舊觀之舉，但在一三九三年帖木兒入侵時又遭到挫折。回教文化對西方文明和文藝復興應可產生更大的影響，若非其資料遭到如此大規模的破壞。雖然如此，回教世界（其影響力大都經由西班牙），若就其在文藝復興的前導地位而言，其重要性仍與君士坦丁堡不相上下。而十字軍雖然破壞了許多回教圖書館，他們到底還是為西歐和東地中海地區鋪了一座橋樑。

中古時期的西歐

隨著北方蠻族的入侵和羅馬帝國的式微崩潰，西歐籠罩著一片黑暗。中古時期是很難瞭解的一段時期。就文化方面而言，我們接近於遠古希臘，尤其是羅馬

，而不同於黑暗時期。中古時期，有人譬喻爲一道長遠的隧道，隧道這邊進來的是使徒教會，而另一端出來的是羅馬天主教會——而沒有人確知，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就以英國爲例，在羅馬軍撤退後，便呈現一片騷動混亂，很容易的又被入侵的丹人所劫掠。儘管在安格魯撒克遜誌略（Anglo-Saxon Chronicle）上載有英國人英雄式的事蹟，但許多戰役都像奧緒當（Ashdown）之役一樣，以悲劇式的句子結束：「丹人奪得戰場。」

沒有人能够確切的指出是什麼時候中世紀圖書館從遠古的圖書館脫壳而出，但我們可以說草紙和充皮紙卷爲遠古圖書館的象徵，而羊皮紙古抄本則爲中古圖書館的象徵。然而，長久以來，中古的圖書館是很貧瘠的，遠遜於遠祖希臘羅馬的圖書館。它們通常不過是小心謹慎的守著幾件手稿，由一些犯規被罰抄寫的僧侶出力的抄寫著。館藏很小，通常就只放在櫃子裏。而主要的蒐藏都是聖經抄本，神父的作品，以及教會儀式用的祈禱書。但是若不是這些文化孤品流傳下來，則西方文化傳統的歷史，可能又是另一番景象。

我們習慣的認爲中世紀的手稿是很美麗的文物，綴有小飾畫，飾以金邊或多色花邊，就像時之書（Books of Hours）一般，且由富人僱工完成。但這種珍本絕無僅有。典型的中世紀的手稿是很不起眼的，都是一些僧侶在最差的物質環境下，不經意的抄寫下來的抄本。一遇羊皮紙短絀，僧侶又忙，他們便把古本子撕開，就直接抄寫在這些舊本上。沒有人能够估計，在歐洲歷史這一段陰暗的漫長歲月裏，到底有多少古籍破壞遺失了。但無可諱言的，損失一定驚人，雖然有些書流傳到東方。教皇圖書館（Library of the Popes）的起源，即梵蒂岡圖書館的前身，就像修道院的起源一樣，都在歷史中遺失了。不過，教皇圖書館開始時是與教皇檔案處（Archives of the Papacy）有關的，但圖書館員這個職位則在西元七百年才有。

就圖書館的歷史而言，中古時期的第一個重要人物是卡西爾德洛斯（Magnus Aurelius Cassiodorus）。他曾任東高特在羅馬的統治者索多里克（Theodoric）的秘書。當他於西元五五〇年從公職退休後，即建修道院於維伐崙（Vivarum）。卡西爾德洛斯以其豐富的藏書做爲修道院蒐藏的核心。修道院本身極爲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有關修道院，修道院圖書館，和寫字室等的管理原理和規則的擬定。他的聖學俗學指引（Institutiones Divinarum et Secularium Litterarum）包括了一系列的書籍。這可算是第一部論著敘述圖書選擇以發展適合於中古時期學者的圖書館。卡西爾德洛斯對將知性的作品帶入修道院的生活中，頗具功勞。和他同時代的波索斯（Boethius）則將古典文化介紹到西歐。

與卡西爾德洛斯同時代的，是聖賓尼第克（St. Benedict）在蒙特卡西諾（Monte Cassino）所做的工作。該修道院創建於五二九年，它造就了許多傳

教士，這批傳教士創建修道院和文化中心，遍及西歐。而比維伐崙和蒙特卡西諾的活動更重要的，是由愛爾蘭到北歐來的傳教士。愛爾蘭在五世紀時被聖派屈克（St. Patrick）轉化為基督教。在此，書籍極受尊重，書法被尊為藝術，我們可以看出文藝復興的真正開端始於此地。從愛爾蘭，有聖柯倫邦（St. Columban）到盧森委（Luxeuil）創建修道院，有聖哥樂（St. Gall）之到瑞士，之到德國的烏茲堡（Wurzburg）和撒茲堡（Salzburg），以及義大利的玻比歐（Bobbio），它後來接收了大部分的維伐崙的珍藏。

在英格蘭，修道院及其圖書館是由聖奧加斯汀（St. Augustine）所引進。他是五九七年由教皇格烈格里（Pope Gregory）所任命而赴英格蘭就任。他攜帶了少量的蒐藏以及聖賓尼第克所編的圖書館規則赴任。以此為基礎，一座小圖書館終在康得柏里（Canterbury）成立。在第七世紀，賓尼第克·比斯加（Benedict Biscop）在維爾茅斯（Wearmouth）創建了修道院和圖書館。據說為維爾茅斯和珈洛（Jarrow）的藏書，他曾先後六次到羅馬搜集。約同一時期，其他修道院蒐藏的重要中心尚有法國的柯比（Corbie，據說是西歐最好的圖書館和寫字室），義大利北部的玻比歐。後者在第七、八世紀達到極盛時期。在德國，八世紀期間，聖柏尼菲（St. Boniface）在伏爾他（Fulda），海登罕（Heidenheim）和伏里茲勒（Fritzlar）等地先後創建修道院圖書館。儘管有少數宗教領袖的努力，但從第六到第九世紀這段期間，圖書館建樹不多。惟一的可能例外是西班牙，若干修道院圖書館在此成立，最重要的一所要推塞維的修道院圖書。塞維的主教艾希托（Isidore）擁有至少數百冊書籍的圖書館，其中有許多是非宗教性書籍。這個蒐藏以其數量龐大和內容廣泛而著名。對每位著者都題獻一首詩。對整個館藏也有詩為頌，其中部分如下：

聖書經典互增輝，
任君採擷添智慧。
青青草原富生意，
不乏玫瑰多荊棘。
浩帙卷冊書律典，
新說固珍舊不貶。

孺子廢讀非吾道，
空言總難入堂奧。

恭順的僧侶們似乎耽溺於空言清談，但主教下定決心要把它摒置於圖書館之外。

七八二年，土爾斯（Tours）來了一位學者奧爾昆（Alcuin），他受教於英格蘭約克的天主教學校。好學的法王查理曼（Emperor Charlemagne）把他聘來。奧爾昆在土爾斯建立了一所學校和寫字室，並遣人到英格蘭搜尋手稿。在土爾斯主教奧爾昆的影響下，查理曼帝國內，修道院和圖書館到處林立。皇帝自己有兩所皇家圖書館，一在艾斯里·巴比（Isle-Barbe），另一在約常（Aachen）。但這個文藝復興，即所謂卡羅琳進文藝復興（Carolingian Renaissance），壽命極短。查理曼的孫子禿頭查理斯（Charles the Bald），為中世紀第一位嗜書的公子，他聘請敦斯史考特斯（Duns Scotus）到他的皇家學校，視察指導學校的工作。在西歐，入侵的挪威人將這個發育不全的文藝復興畫上了休止符，封建主義再度橫行。在英國，丹人蹂躪，情形與上述情況差不多。而差不多同時，匈奴從東方入侵，回教徒從南方侵進。修道院圖書館雖在崩潰瓦解中得以倖存，但就中世紀圖書館事業而言，在這期間是毫無進展。

圍繞着主教和大主教所在地的大教堂而發展的天主教學校，可以說是訓練教士的大學，若放寬的講，甚至可以說是平民的大學。這些學校的圖書館，在時間上比修道院圖書館還遲，且有較好的支持。他們的蒐藏較大，其內容也不局限於宗教性書籍。較著名的，要數英格蘭的約克（York），康得柏里，得罕（Durham），法國的諾特丹（Notre Dame），盧安（Rouen），西班牙的托利多，巴塞路那（Barcelona）。不過，到了中世紀末期，教會漸漸失去在文教上獨占的地位，而貴族們開始蒐集圖書設立圖書館，有點像早期古代的貴族階級。

大學的前身，和圖書館一樣，要溯自好幾個世紀以前。它起源於一小夥學生包圍一位老師，並跟隨老師遊學各地。約在十三世紀，這些小團體開始聚集合併成為今日的學校。課程和學業告一段落便授與學位等觀念，發展緩慢。早期的大學是學生和老師團體的聯盟，與技藝人員的基爾特無異。大學這個名詞源自拉丁的 Universitas：意指任何有組織的團體。大學這個觀念在法國、英國和義大利發展的時候，很可能借自回教的西班牙。這些早期的大學沒有圖書館。老師和學生自己想辦法求取書籍。例如，在巴黎大學附近，賣書是利潤很厚的行業，市政府還制定法律加以管理，以保證學生購得正確的教本。學生聚集一處起居共同的情形，漸漸的產生了學院的構想，而許多地方還有少量書籍供學生使用。一二五〇年，羅勃·索本（Robert de Sorbon）捐助巴黎大學的一所以他的名字為名的學院，並將他的私人圖書館贈與學院，外加一筆發展圖書館的基金。相繼而來的贈書使該館藏日益增多。到十四世紀，巴黎大學各學院也開始發展他們自己的圖書館。牛津大學的圖書館歷史則較複雜，而一三五〇年伍思特（Worcester）主教湯姆斯·柯布罕（Thomas Cobham）的贈書，帶給大學很大的影響。在劍橋大學，圖書館的歷史大同小異；館藏始於學院少量的書籍蒐藏，其

增大則有賴於各方的遺贈和捐贈。

認真說來，中世紀的大學是中古世紀和古典文化的回歸，（即所謂的文藝復興）兩者之間過渡時期的橋樑。從這些大學和圖書館，產生了文藝，此文藝奠定了文藝復興的基礎。

任何有關中世紀圖書館的討論，到理察·柏里（Richard de Bury）應告一段落。柏里逝於一三四五年，他為牛津做了最不平凡的圖書館發展計劃，雖則當時計劃並未實現。柏里是得罕的主教，後來並為英格蘭的財政大臣。雖然他不是位出色的學者，却是當時最具影響力和最熱心的藏書家。臨終前他寫了一本「喜書記」（Philobiblon），細述書籍和讀書的樂趣。因為它的文學上的價值，以及它對中世紀學者所獨具的眼光，這本書今日仍被閱讀着。

文藝復興

義大利學者和人文學家彼特拉克（Petrarch），他效法西塞祿典型，實不止於「文藝復興的晨星」而已。他和他的義人同胞布卡吉奧（Boccaccio），為圖書館的發展開闢了新紀元，並對喬叟（Chaucer）及其時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彼特拉克和布卡吉奧兩人都擁有大規模的私人圖書館，並且鼓勵藏書以及圖書之利用。兩人都唾棄中世紀而傾心於古典。一三六二年，彼特拉克將他的圖書館捐給威尼斯的聖馬克教堂（Basilica of St. Mark），「為的是慰候聰慧和高尚的人們，他們也許會喜歡這些事物。」

彼特拉克的影響，到十五世紀達到極點，當時對藏書和古典的狂熱遍佈各地。在弗羅倫斯（Florence），柯西莫·梅迪奇（Cosimo de Medici）得其「圖書館大臣」尼古吏（Niccoli），之助，着手蒐集圖書，到孫子洛連祖·梅迪奇（Lorenzo de Medici）時，它已是著名的羅侖田（Laurentian）圖書館。除了威尼斯和弗羅倫斯之外，義大利各城市的貴族也都成了熱心的藏書家。對藏書的興趣，持續了整個十五世紀。

十五世紀規模最大且最重要的圖書館，要數梵蒂岡。該圖書館原起於艾維嫩（Avignon）時期的教皇，後來在教會分裂時散失殆盡。新館蒐集的真正動力，來自教皇尼古拉斯五世（Pope Nicholas V, 1447-1455），他對學術和藏書早有興趣，又得圖書館員陀帖吏（Tortelli）之助，遍找歐洲圖書市場，而使羅馬和梵蒂岡再度成為圖書館界的重要中心。薩克斯特斯四世（Sextus IV, 1471-1481）繼承尼古拉斯的工作，並將圖書館開放，任何人欲利用圖書做學術研究的，都可使用。梵蒂岡藏書內容的廣泛，為文藝復興時代圖書館的典型。世紀以來，它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研究圖書館之一。在美國，我們很感幸運的在聖路易大學（St. Louis University）備有梵蒂岡圖書館館藏內容的顯微影片。

在西方，活字版印刷術，一般認定是周汗·古登堡（Johann Gutenberg

）在一四五〇年於曼玆（Mainz）所發明，戲劇性的影響了圖書館的發展。它斷絕了寫字室和圖書館兩者之間長遠而密切的關係。而圖書館再也不憂慮圖書的出版。更甚者，由於能容易的大量製造圖書，雖然在當時圖書的印刷出版仍嫌麻煩，圖書供應不慮匱乏，它們不再拴在書桌或閱覽桌上以防偷竊，在中世紀拴書在桌上通常是必要的措施。甚至於圖書館的建築也改變了。圖書放在空曠天井周圍的走廊上，陽光由屋頂上的玻璃天窗透射進來。天井除了放置閱覽桌外，並有展覽手工藝品的地方，這使圖書館和博物館兩者更為接近。最重要的是，印刷術的發明把圖書世界介紹給前所未有的廣大羣衆，少數特權階級獨占學術的局面終於打破。它爲未來的宗教改革，科學研究，和啓蒙思潮打開了一條大道。

宗教改革

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於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將他的九十五條提綱釘在威敦堡（Wittenberg）天主教堂門上，因而對教皇無上的權威提出挑戰時，宗教改革即已開始。這次革命性的運動，加上德國的農民革命，法國雨格諾（Huguenot）新教徒的鬭爭，以及英國的三十年戰爭，破壞了許多修道院及其所屬的圖書館。許多書籍，經苦心蒐集並保存了好幾個世紀，都被視爲「歌頌教皇的文件」而遭破壞或任其散亂。但並非所有的宗教改革的勢力都是破壞性的。一五二四年馬丁路德在致全德市長和議員的一封信中，他寫道：「最後，這一點也必須加以考慮……應盡財力和能力所及，在可利用的建築設立良好的圖書館，尤其是在財力充裕的大城市。」路德並不僅是空言侈談，而且腳踏實地推動。經過幾番努力，許多市鎮都設有圖書館，雖然這些圖書館並非今日我們所謂的公共圖書館。圖書通常由一機構流通到另一機構。而書籍的使用仍局限於少數的特權人物；圖書館的發展也端賴偶發事件和捐贈的慷慨。富豪人家開始蒐集圖書，成立圖書館，一如古典時代，而在麥遜（Meissen）志略記載著：「大部分的貴族和市民，雖然不做研究，至少也能寫會讀，他們蒐集優良的圖書用以充實私人圖書館，藉此呼引優秀的史家，醫生及其他等益友到家裏，這是很平常的事。」甚至在技工階級，對於圖書蒐集，尤其是科學和技術性資料，也都略知一二。在十六世紀期間，德國成了國際書籍商業的中心，著名的弗蘭克福書展（Frankfurt Book Fair）目錄更提供了當時最完整的歐洲著作清單。一五四五年德國醫生兼學世聞名學者孔羅·蓋世諾（Konrad Gesner）的環球書目（*Bibliotheca Universalis*）開科學性書目之先鋒，該書目係全世界著作的分類書目，最後兩冊未能完成，因爲他不幸患上瘟疫而逝。

在法國，皇家圖書館在法蘭西斯一世（Francis I）後繼諸人下繼續滋長繁榮，由於他們嗜愛風雅，許多圖書都由手藝精湛的法國名匠精心裝訂。皇家圖書館繼續成長，先是添加了凱撒琳·梅迪奇（Catherine de Medici）的蒐藏，

後又加上了紅衣主教奧莫斯 (d'Amboise) 的藏書。當它從范田莫洛爾 (Fontainebleau) 搬到巴黎而置於圖書館員格里高特 (Grigault) 領導之下時，皇家圖書館又向前跨了一大步。格里高特於一六二二年編製了圖書目錄。

但是在這一段期間，皇家圖書館在紅衣主教馬撒琳 (Mazarin) 的私人圖書館相對照下而失去光彩。他的圖書館員蓋布里·諾第 (Gabriel Naud'e) 走訪歐洲諸書市場而建立了當時最著名的圖書館。這位學者極力贊成建立完整良好的蒐藏以供他的重要顧客使用。一六二七年，他出版第一本圖書館組織和管理的指導書籍，或稱手冊，亦即是組織圖書館指導 (Advis pour dresser une bibliothèque)，此書後來由著名的日誌學家約翰·艾弗林 (John Evelyn) 譯成英文，名為 *Advice for Forming a Library*，今日讀之，仍可獲益不少。在此論著中，諾第陳述他的藏書哲學，強調現代書籍和古籍珍本的重要性，異教書籍和支持宗教的書籍同等重要，並主張依主題分類系統排列書籍，俾易了解。當他於一六四二年開始為馬撒琳服務時，總算找到了一個可以實現他理想的機會。不幸的是，馬撒琳失勢，四萬冊優良的蒐藏成了法蘭地 (Fronde) 內戰的犧牲品。當馬撒琳復出後，雖曾力圖重建館藏，但為時已晚，此時諾第業已去世。要認識諾第的精神，我們必須了解，諾第與果洛休斯 (Grotius)、霍伯茲 (Hobbes)、伽利略 (Galileo)、柯普勒 (Kepler)、培根 (Bacon) 和笛卡兒 (Descartes) 等諸大師乃屬同時代人物。此一時期的確是圖書館員活躍的時代，因為人們不僅蒐集圖書，而且研究利用圖書，而圖書館做為學者和科學家的實驗室的重要性，普遍被接受。正如諾第自己說的，他有很好的實例指導他。

湯姆斯·伯特力爵士 (Sir Thomas Bodley) 便是實例之一。他是標準的伊麗莎白朝代人物，求學牛津，執教牛津，且是顯赫的政治和社會人物。晚年，他認為他能對他同胞作最大服務的，便是重建被冷落多時的牛津大學圖書館。一五九八年，湯姆斯爵士向副校長提議，他願負重建圖書館之責。經過五年的奔走募捐，重建蒐藏，重修舊館，圖書館終於開放。圖書館命名為伯特力圖書館以紀念他的偉業，再也適當不過了。他說服史提詢納 (Stationers) 公司出版新書時，送一本給該圖書館，是為早期的版權託管制度。遺囑中他將所有財產送給圖書館。今日，伯特力圖書館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圖書館之一。同一時期，米蘭天主教菲德里格·玻洛密奧 (Federico Borromeo) 創建了安莫斯亞圖書館 (Ambrosian Library)，在其珍藏中，包括來自玻比歐修道院圖書館的許多手稿。而十七世紀，梵蒂岡圖書館也有了重要的進展，將一些早期重要圖書館藏歸入保管。

· 31 ·

啓蒙時期

啓蒙時期，可從十七世紀下半葉算起，一直到十八世紀末葉爲止。此時期在牛頓·霍伯茲·洛克（Locke）、和康德（Kant）諸輩引導下，是爲物理和社會現象密集研究時期，而此又得力於伽利略、柯普勒、培根、和哈比（Harvey）等諸人的在前開路。它是一個知識組織、分類、和聯想結合的時代。它是許多優異科學性社團成立的時期，山貓眼學術院（Academia dei Lincei, the Academy of the Lynx-Eyed）於一六〇〇年成立於羅馬，一直延續到一六五〇年；科學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於一六六六年成立於巴黎；倫敦則有一六六〇年的皇家學社（Royal Society），它的成立淵源於法蘭西斯·培根的科學團體的理想。在此期間，不僅有種新的動力推動館藏的擴展，並注意及館藏的組織管理。在法國，傑出的柯伯特（Colbert）得史學家兼圖書館員貝魯茲（Beluze）之助，跟隨紅衣主教馬撒琳的脚步，將皇家圖書館擴展充實。他於一六六一年接長該館。由於培根的知識分類的理念之衝擊，皇家圖書館對於資料的分類也漸重視。十八世紀中葉，迪特洛（Diderot）和奧林伯特（d'Alembert）合編的百科全書巨構業已着手。透過修道院長珍·保羅·貝南（Jean Paul Bignon）的影響，皇家圖書館舍得以擴充，其館藏並供啓蒙時期學者利用。

在法國，皇家圖書館的改進是由帝王發起，在英國則由國會發動。十七世紀期間，曾有創設規模宏大的圖書館於倫敦之議，但未見諸行動。十八世紀初葉，理查·卡得里（Richard Bentley）向國會建議創設國立圖書館。但一直到三十年後，透過御醫漢斯·史龍爵士（Hans Sloane）的努力才見諸行動。史龍在他遺囑中囑將他的私人藏書獻給國家，而換以金錢付給他的後代，國會於一七五三年接受此項交易。史龍的蒐藏得與羅勃·布魯斯·卡頓爵士（Sir Robert Bruce Cotton）和羅勃·哈里（Robert Harley）諸人的藏書會合。卡頓的藏書於一七〇〇年由其子捐贈給國家。羅勃·哈里於一七二四年逝世時其珍貴的蒐藏業已出售，但國會授權搜購其手稿蒐藏。最後，喬治二世（George II）將他的私人藏書捐出，終於奠定了大英博物館的基礎。大英博物館於一七五九年在孟大古建築（Montagu House）敞開大門。如今，它不僅是英國的國家圖書館，而且是最偉大的博物之一。它藏有羅塞達碑石（Rosetta Stone）、艾爾進石彫（Elgin Marbles），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品和工藝品。現有計劃將博物館和圖書館分開，而將一些政府特殊的圖書館併入圖書館部分。這種發展，將可澄清博物館長期雙重的功能。

德國啓蒙運動的領導者和執牛耳的人物要推古第萊·威爾翰·萊比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他是位圖書館員，爲圖書館員的工作立下了許多重要原則。年青時，他是他父親圖書館裏貪婪的讀者，後來他當了曼茲著名書家波尼堡（Boyneburg）氏的圖書館員。就在該任期間，他首次發行他的

夢想，即每半年一次的圖書目錄。他並將這些目錄累積彙編成爲「包含在書中的人類知識的清單」。他認爲，惟有學者能迅速方便的檢尋前人研究的成果，知識的進步方成爲可能。正值柯伯特大事擴展皇家圖書館時，萊比尼茲訪問了巴黎，貝魯茲且是他的摯友之一。他同時也熟讀了諾第的圖書館組織的著作。一六七六年他被任命爲哈諾墨（Hanover）的圖書館員，十五年後，他成爲著名的喔范布特（Wolfenbüttel）圖書館館長。雖然他對館藏的擴展和組織績效頗著，但他對於圖書館界最重要的貢獻，却是他在日常書信中所闡述的原則，以及他對在位的帝王所提的建議。我們確知，萊比尼茲的許多有關圖書館的觀念，並非他所獨創，而借自前人之處頗多，但這並未減損他的著作的重要性。他對圖書採購、組織、分類編目等的影響達數世代，甚至今日，仍有蛛絲馬跡可尋。

雖然學者對新科學的探討，繼續不斷，但到法國革命和浪漫主義運動時期，啓蒙運動可說即已告終，和以前幾次革命不同的是，這次震撼法國的革命，並未對圖書館構成重大的損害，而是分散了圖書館。據估計，在此期間八百萬多冊書易手，單在巴黎一地，據估計就有二百萬冊易主。從一七八九年十一月到革命結束，藏書流散各地。甚至今日，偶爾還可在遠離巴黎的偏僻小鎮發現不可思議的珍本古籍。十九世紀對圖書館發展的偉大貢獻，除了圖書館的繼續擴展和成長外，便是公共圖書館運動的產生。要探究公共圖書館運動的起源，我們必須轉向我們自己的國家。

十九世紀的歐洲

如上所述，法國革命並未造成藏書批發式的破壞，而僅是圖書的重新分配。在法國，政府依法沒收而儲放於國立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和省市地方圖書館的書籍，據估計有數百萬冊。儘管資料離散，革命對圖書館的主要影響之一，是法國國立圖書館的成長。由於政府的沒收政策，它的館藏激增。第二個重要結果是，圖書是供一般民衆使用的原則之宣布與實踐。不僅在革命期間，而且在革命後數十年間，必有不少的珍藏遺失了。然而，公共圖書館爲人民所共有，而非少數特權階級所獨享的觀念，終經確立。其後這個觀念經由富蘭克林（Franklin）和傑弗遜（Jefferson）者人物而反應在美國本土。

十九世紀的德國，學術圖書館的傳統支配了圖書館界。此可以哥庭根（Göttingen）和特雷斯登（Dresden）等地的大學圖書館爲例。在德國，日益深植的國家意識和變化中的社會組織，產生了圖書館應爲公共設施的觀念。而學術活動也普遍增加，此對圖書館很有裨益。但圖書館界對此沖激毫無準備。雖則哥庭根和特雷斯登可供效仿，但受過訓練的專業圖書館員仍付闕如。

十九世紀德國的學術風氣流傳到美國的圖書館和高等教育。十九世紀初期，哈佛和東部幾所大學的畢業生，經常到德國優良的大學旅行留學，以繼續其教育

。他們帶回來德國的教育思想，在今日的美國研究所教育中，仍可窺見其影響。約瑟夫·格林·柯斯威（Joseph Green Cogswell），他後來因出任紐約艾斯托圖書館（Astor Library）主任而馳名，曾根據哥廷根大學的分類表重整哈佛大學圖書館。喬治·帖克諾（George Ticknor）和艾德華·艾弗烈特（Edward Everett）兩位精力充沛的波士頓公共圖書館第一屆董事會領袖，也都深受德國圖書館傳統的影響。帖克諾根據他在哥廷根的經驗，推展波士頓圖書館聯盟的計劃。

十九世紀的英國圖書館界，為兩位巨擘所左右，即安東尼·帕尼基（Anthony Panizzi）和艾德華·艾德華茲（Edward Edwards）。義大利人帕尼基是於一八三一年被任命為大英博物館的特別助理，一八三七年被昇為圖書部管理，一八五六年成為主圖書館員。他對英國圖書館界的影響，幾乎遍及每一個角落。他曾說過：「大英博物館並非展覽館，而是文化傳播的機構。它是國家文官制度的一部分，應與其他公共行政機關的同等精神來行事，而其管理應盡量公平寬大。」③波士頓的伽里·史巴克斯（Jared Sparks），深為大英博物館的使用情況感動，在信中他寫道：「在（大英博物館）閱覽室裏，每日至少有一百位的讀者聚集於此，其中包括各國各地人物，勤苦的學者，好學的淑女，面帶神秘的莊重老人。何時我們才能在（波士頓的）圖書館見到類似此種的景象？」④

在大西洋這邊，帕尼基最為人所熟知，他奠定了安格魯——亞美利加編目規則，今日的編目規則即由此衍變而來。帕尼基的學識將大英博物館建設成為今日的偉大圖書館。艾德華·艾德華茲則在英國提倡公共圖書館運動中，扮演了領導角色。他的理論精闢又負實際工作能力，加上勤苦不懈。他與國會合作，促進立法以獎掖公共圖書館。英國公共圖書館運動的發展與美國的圖書館極為相似。邁徹斯特（Manchester）公共圖書館在艾德華茲的籌劃下於一八五二年開放。在許多方面，此事之於英國圖書館歷史可媲美波士頓公共圖書館之於美國圖書館史。一八五〇年，議會通過許可性的立法，授權地方社區，市區及自治城市，其人口超過一萬者，得自動設立公共圖書館。自此以後，時有關於圖書館的立法，而於一八九二年的公共圖書館法案達到高峯。該法案規定，在英格蘭和威爾斯的市區和教區，其不屬於任何市區者，應為圖書館區。約在同時，適用於蘇格蘭和愛爾蘭的類似的法案也通過了。英國圖書館學會（British Library Association）於一八七七年成立，正是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就位五十週年紀念。在此前一年，即一八七六年，美國圖書館學會（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於美國立國一百週年之際成立。跟美國一樣，英國公共圖書館的發展得力於安志洛·卡內基（Andrew Carnegie）之助者甚多，一九一三年卡內基聯合王國信託公司（Carnegie United Kingdom Trust）成立。

很顯然的，原籍蘇格蘭的安卓魯·卡內基對英格蘭的感情，與詹森博士（Dr. Johnson）之對於蘇格蘭有所不同。而導致全國性範圍的重要因素，是國立中央圖書館（National Central Library）的發展，亦即現今的國立出借圖書館（National Lending Library）。由於卡內基的一筆補助，國立出借圖書館成立於一九一六年，最初為學生圖書館中心（Central Library for Students），是為書目資料中心和圖書出借機關。藉卡內基信託的支持，它得以繼續發展其功能。它對英國館際互借以及英國和外國圖書館合作之促進，影響甚大。

十九世紀這一期間，歐洲各式圖書館發展的盛況，為空前所未有，尤其是公共圖書館以及它們的蒐藏。十九世紀後半期日益增加的科學探討，對科學文獻的運用產生了新的要求，特別是日益增殖的期刊文獻。科學家強烈的需要有效的書目編製，以此為背景，我們才能了解一八五一年開始的皇家學會的科學論文目錄（Catalog of Scientific Papers），它嘗試為十九世紀的科學性出版品編製索引。而在世紀末葉，產生了保羅·奧特烈（Paul Otlet）和亨利·拉法田（Henri La Fontaine）的歷史性會談，他們的計劃召開國際性書目會議，以及布魯塞爾書目協會（Brussels Institute of Bibliography）之成立，它後來演變為國際文獻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Documentation）。關於這些發展，待第四和五章再贅述。

歐洲和英國對美國公共圖書館的影響是雙方面的。直接方面而言，歐洲圖書館的組織模式實際移植，助長了美國圖書館的事業。圖書俱樂部、聯誼性圖書館、資料的流通等，都源自歐洲，或由有企業心的商人由歐洲輸入。這些商人在歐陸本土成功的掌握了讀者的慾望，來此探索開拓美國公眾閱讀的領域。間接方面，以其豐富的蒐藏以及組織，歐洲對美國人民心靈暗示圖書館在新文化統合中的重要性。在新罕什爾的彼得堡洛（Peterborough）、麻薩諸塞的威蘭（Wayland）和波士頓等地圖書館開始起步，奠定了今日美國公共圖書館制度的基礎。雖其興起的過程具美國特徵，但其運動的前導則大部分源自歐洲。

美國圖書館運動

在大西洋這邊，研究性圖書館，主要是那些與學術機關有關的，都是模仿歐洲既定的型式，甚至高等教育本身也是如此。但公共圖書館經費取之於眾，用之於眾的觀念，倒是一項大膽的發明。美國公共圖書館的根基植於古典的傳統中，經文藝復興和啓蒙運動而更滋長，而在民主教化下開花結果——即對普遍化平民教育和完整個人的信心。

殖民地時期的圖書館

美國文化源自英國，至今仍大部分保持如此。雖由於新環境和各地移民潮的影響，它屢經更新再造，但英國的傳統，若說不是支配美國文化，仍可說是影響非常強烈。自普利茅資岩（Plymouth Rock）登陸以來，歷經一世紀半，殖民地的移民出奇的大都來自同一國度；他們經常回顧祖國的信仰、制度、以及職業模式。若清教教義說地獄熾熱，則馬薩（Mathers）和艾得伍茲（Edwardses），以及宗教覺醒時期（Great Awakening）的諸大師也都毫無異議。圖書館的觀念也不例外，它們也是從歐洲英國傳到此岸。

當移民於普利茅資岩登陸時是否攜帶書籍同來，史無記載。然而，九年之後，即一六二九年，一批新教徒帶了一批書到麻薩諸塞灣（Massachusetts Bay）的約翰·硯迪考（John Endicott's）殖民區。其中包括威廉·白克豪斯先生（Mr. William Backhouse）的八本書名未詳的書籍，五十四本「教義的書籍和小冊子」，以及「兩打外加十」的教義問答。沒有人知道為何書籍流傳到此以及書籍的使用情形。雖則一般推測，可能是用來感化印第安人改信基督教。一六三八年，約翰·哈佛（John Harvard）逝於英國，他將財產和四百冊書籍遺贈給查理河（Charles River）畔紐頓（New Towne）城剛成立才兩年的一所學院。為感謝他的遺贈，大學乃命名為哈佛學院，該地後來也改稱為劍橋（Cambridge）。這批藏書，以及以後陸續添增的書籍，均供教授，高年級學生以及附近的牧師使用。

美國殖民地時期第一所真正的市鎮圖書館是捐自怪異惡名的羅勃·奇尼上尉（Captain Robert Keayne），他於一六五六年逝世時遺贈波士頓一筆款項，用以建造一座可以容納市場，軍械庫和圖書館的市鎮公館。他將私人圖書捐出作為成立圖書館的第一步。他的後嗣有權擇取他們要的圖書，其餘則悉數捐獻，連同他自己有關聖經評註的手稿。他的遺贈波士頓欣然接受，館舍平地起，圖書館也成立了，各方陸續的捐贈和一些市政案卷之放存，使館藏益增，圖書館延續將近一世紀。雖原建築於一九一一年燬於火災，惟公衆關心乃得以重建新館，不幸新館又於一七四七年慘遭回祿，終未能重建。一六五六年，殖民地紐哈本（New Haven）由錫奧弗列斯·依頓（Theophilus Eaton）遺囑中獲贈一筆圖書，作為擬議中的大學之用。到了一六六八年，此殖民地與康涅克迪克（Connecticut）殖民地合併。這批圖書，外加其他添增的捐贈，成了紐哈本市鎮的財產。一六八九年，這批藏書賣給了紐哈本教堂的牧師詹姆士·披爾品（James Pierpont），代價是「四十磅的黑麥和三十二蒲式耳的玉蜀黍。」

據傳說，一七〇一年的某一星期日晚上，一羣人聚集在康州布朗佛（Branford）撒彌兒·羅素（Samuel Russell）家中，每人帶來書籍數本，放置桌上，說道：「為殖民地設立一所大學，我捐出這些書籍。」這便是耶魯大學的開端。我們獲知詹姆士·披爾品是其中人士之一。而我們上面剛提及的依頓的書籍

，傳說也是捐贈中的一部分，但此純屬揣測而已。然而，我們確知一件事，即數年之後，上述大學由布朗佛搬到紐哈本時，一羣憤怒的住民襲擊並企圖奪取圖書運輸車，以阻止大學的遷移。在此次混戰中，許多書籍被毀。碩果僅存者現珍藏於耶魯大學圖書館的「一七〇一圖書館」。

麻薩諸塞的康可（Cohcord），一六七二年的市鎮紀錄記載著：「殉難書（Book of Martyr）和市鎮所有書籍應妥加保管。」我們所知者，僅止於此。在第十八世紀早期，英國傳教師湯姆斯·布雷（Reverend Thomas Bray），有感於在美國殖民地的傳教士，無法獲得傳教所需的書籍，乃組織一個團體蒐購圖書，分送大西洋沿岸各教區，大部分在馬利蘭，維琴尼亞和卡羅萊納。而至少有一部分送到波士頓的御皇教堂（King's Chapel），而現在珍藏於波士頓文藝館（Boston Athenaeum）。據估計，經布雷基督教傳播社（Bray's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Christian Knowledge）的努力，總計約有三萬五千冊圖書分送到四十個不同教區。有了這些贈書，有關書籍的組織和管理的說明也隨着到來。布雷還親自到美國，視察是否實行他的計劃。這些書籍通常保存在教區內傳教師的公館，後來則淪落各地散失殆盡。雖然如此，幾十年來，它們是新世界的邊疆地帶裏的一種圖書館制度或圖書館網。一七一九年和隨後的幾年，麻州牛津城接受了幾筆贈書做為圖書館之用。一七三一年，麻州東沙得柏里（East Sudbury）也獲贈類似的贈品，同年，麻州蘭卡斯特鎮（Lancaster）投票決議，購買牧師撒彌兒·威樂（Samuel Willard）的神學大全（Compleat Body of Divinity），全書達一千餘頁，為當時殖民地印製的最大的一本書。

聯誼性圖書館

殖民地圖書館的下一步發展，則來自那位卓越的政治家，學者，發明家和事務家的賓哲明·福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一七二七年的秋季，福蘭克林剛從英國回來，他在那裏曾是合格的印刷工人，他集合了一羣和他一樣的年青技工組織了一個討論會，定期聚會討論當前的問題。很顯然的，這個名叫「秘社」（Junto）的團體不久就需要一個圖書館來參考並支持他們的討論。因此規定每個會員需帶私人圖書存放於聚會處，供其他會員使用。這個計劃創始於一七三〇年，一年之後便告失敗，原因很明顯的是因為年青人不願丟失自己的圖書。一七三一年，福蘭克查成立費城圖書館公司（Philadelphia Library Company）。這個自願的組織，每位會員認購股票。每年股票收入即充當購買圖書供全體會員使用。在這個新嘗試下，第一本書於一七三二年三月卅一日從倫敦抵達。這個圖書館，福蘭克查在他的自傳裏（四十多年之後所寫）寫道：「是北美會員圖書館之母」，如今仍然存在。它續獲贈許多贈書而日益增大，其中最重要

的部分是詹姆士·羅根（James Logan）的私人圖書。此圖書館公司是我們的圖書館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我們有理由相信，這種組織的觀念來自英格蘭。當福蘭克林在英國時，必定見過類似的「圖書俱樂部」，這種組織在倫敦及其他英國城市並不稀奇。一七三三年，康涅克狄克的得倫圖書館公司（Library Company of Durham）成立；一七三七年，又有塞布洛克·萊姆·基爾佛圖書館公司（Library Company of Saybrook, Lime, and Guilford）。一七三九年，同一殖民地的利巴諾（Lebanon）和龐弗萊德（Pomfret）等地也有類似的組織。其中最早的一個組織稱之為「愛文法社」（Philogrammatican Society）。任何的這些組織，似乎都不可能源自福蘭克林的嘗試。因為在此初期，福蘭克林的名字還未具什麼魔力，假設這些組織乃模仿英格蘭類似的組織，似乎更切近事實。不管這些觀念的根源來自何處，以自動自發方式組織圖書館以適應地方的需要，開始萌芽發展。一七四七年，由於亞伯拉罕·雷烏（Abraham Redwood）的慷慨成全，類似的圖書館在羅德島的新港（New, Rhode Island）成立，它和費城圖書館公司一樣，現仍存在而且還在本來的建築裏；加入成為它的會員是一項社會威望的標誌。

慢慢的，這批需要圖書的一小夥人，通常是城裏的傳教士，教師，律師和其他專業人員，他們沿着大西洋岸發展，成立圖書館。這些圖書館在革命戰爭後益趨鼎盛。而當人民向西拓荒時，圖書館也隨着往內移。如今流傳下來的最著名的所謂聯誼性圖書館，當推波士頓文藝館，它創建於一八〇七年，立於比康山（Beacon Hill），它的股份通常世襲，被視為傳家之寶。

需要圖書的人士自動自發的組織起來，是件順理成章的事，因為有許多功能——諸如濟貧，救火，治安，供水等——今天被視為是州或地方政府的責任，在早期都是以自動的組織型態出現，即利益不同的團體簽約，互助互濟。這些社團性圖書館，或聯誼性圖書館，各有不同的型式以適應特定的目的，其分佈遍及全國，至今仍有少數圖書館存在。有為律師，傳教士，青年，工商學徒，甚至婦女的聯誼性圖書館。從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這些圖書館很接近公共圖書館制度。全國各地，無處沒有聯誼性圖書館，有的甚至有聯誼性圖書館數所，這些圖書館通常是法人組織，在殖民地期間根據殖民地政府和英國政府的法案組織而成，獨立戰爭後則依據州法。有許多州通過法律，准許這些圖書館不必訴之州法人組織法而可自組法人團體。

與這些聯誼性圖書館同時的，還有所謂「流通」（Circulating）圖書館，今日或勉強可稱之為圖書出租；讀者付錢租書，通常以日計。這些純粹是商業性質，通常與書店，印刷商或普通商店有聯繫，而藏書通常包括當代小說和其他「暢銷書」之類——即大眾普遍閱讀的讀物。這種事業，在一七四五年詹姆士·派克（James Parker）把它介紹到殖民地美洲以前，在英國早已盛行。派克為

圖恢復紐約圖書館公司 (New York Corporation Library) 的財政，將藏書出租；他和福蘭克林曾一度同夥。一七六二年，威廉·林得 (William Rind) 在馬利蘭州的阿那波利斯 (Annapolis, Maryland) 宣佈一項大規模的圖書館租借計劃，但未見實現。第一個真正成功的嘗試，要推約翰·美因 (John Mein) 於一七六五年創設於波士頓的流通圖書館，生意似乎很興隆。同年他還發行了圖書目錄。但因為與企圖脫離英國統治的人士發生衝突 (他本人屬親英派)，幾年後他逃回英國，他的倫敦書店 (London Book Shop) 和他發行的波士頓新聞 (Boston Chronicle) 均不幸告終。許多流通圖書館都還算成功，而為圖書館史的一部分。

這些圖書館的主人為迎合大眾的胃口，書架上充塞了沒有文學價值的小說，因此遭受了嚴重的非議，通常這些攻擊來自宗教人士。在英國，圖書館通常集中在遊樂城市，其藏書更差。以致「消滅罪惡協會」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Vice) 鼓吹制定流通圖書館法規以便管制，而家長也不放心讓兒童使用這些圖書館。婦女的使用這些圖書館，問題更發展到對教育女子閱讀的適當性，引起了嚴重的懷疑。雪里當 (Sheridan) 的安東尼·阿布索流特爵士 (Sir Anthony Absolute) 抱怨道：「鎮上的流通圖書館是邪惡知識的常青樹，它經年盛開！——瞧着吧，瑪拉普羅普太太，這些喜好把葉玩的人們，終將得惡果。」

公共圖書館的濫觴

對民主——即堅信人民能自作決定以管理自己——的信心，賦與合衆國先賢建國者生命，這種信心比革命戰爭本身更具革命性。革命戰爭是典型的被暴君壓迫的人民之揭竿而起。而美國憲法確認人民參政的權利。為使人民能够理智的行使這些權利，人民必須是受教育的人民。因此，在自由的教育制度下接受教育且能自由接觸知識的開化的選民，乃為必需。道理至為明顯。

一直到十八世紀末葉，尚無真正的公共圖書館，此地意指由公共財力支持並對社會公開的圖書館。甚至聯誼性圖書館，其會員仍局限於財力負擔得起的人士。圖書館本為社會精華份子，學者，學人，及工作或職業需要用書的人士所設。真正公共圖書館的觀念，是在十九世紀早期，隨著普遍公共教育思想的興起而來。在一八四〇年代何拉斯·曼安 (Horace Mann) 和亨利·巴那 (Henry Barnard) 所領導的運動，對公共圖書館的觀念鼓舞很大。他們不僅在學校區域設立圖書館以輔助教育，而且倡導設置公共圖書館以服務公眾。何拉斯·曼安所說的它將是「我們公共學校的無上光榮。」據史載，早些年有些州議會即有在校區設置圖書館之議：紐約州於一八三五年，由於州長迪威特·克林頓 (DeWitt Clinton) 的影響；麻薩諸塞於一八三七年，是何拉斯·曼安的努力成

果；一八三九年之於康州，和一八四〇年的羅得島，都得力於亨利·巴那的領導。不幸的是，這些圖書館並沒有達到倡導者所預期的目的。可供運用的稅徵基金太小，財源短絀不足以維持圖書館，且圖書館常為出版界非法剝削的犧牲品。慢慢的，對學區圖書館的熱心贊助，不幸告終。聯誼性圖書館也告不穩，許多社團圖書館存在為時甚短，倡導者失去興趣，乃遷移他鄉，抑或老死。雖然如此，這些運動却有出奇的韌性。往往一館剛倒，另一新館又起。有些地方，這種小型圖書館流傳三、四代者，但它們終究太過依賴個人財力，難以長久。少數例外如費城圖書館公司，新港的雷烏圖書館（Redwood Library of Newport），以及波士頓文藝館。這些圖書館也不止一次遭到財政困窘的威脅。若要實現圖書館為大眾所有的理想，必得尋求固定的財源來支持它。

一八〇三年一月，波士頓書商卡里朴·賓罕（Caleb Bingham）鑒於年青時在康州塞利斯玻里（Salisbury）缺書的困境，乃慨將一百五十本適合九到十六歲青年閱讀的書籍贈送該城。這些藏書後來即成為賓罕青年圖書館（Bingham Library for Youth），它對全體居民公開，為該城的財產，由一永久性的董事會管理。一八一〇年四月九日，地方人士集會議決撥公款一百元輔助圖書館，以後並曾繼續撥款補助，充實藏書。不過由於乏人管理，這批書最後併入史考維紀念圖書館（Scoville Memorial Library），即現今的公共圖書館，該館建於十九世紀末葉。這批書現仍存於該館。塞利斯玻里乃聲稱是他們在大西洋這邊發起了公共圖書館，而他們的圖書館是世界上第一座公共圖書館。

對於塞利斯玻里的這項聲明，惟一挑釁來自新罕什爾的彼得堡洛，該地的公共圖書館有一段極其不平凡的歷史。在一八一九年，美國最高法院傳下對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案的判決，裁決新罕什爾州根據合同，需維持達特茅斯學院為一私立學校，不得據為州有財產。為此辯護的是該校校友丹尼爾·韋布斯特（Daniel Webster），他為母校有效辯護，阻止了州政府的干涉。這一判決是憲法上一項很重要的決定。因為它首次言明，州政府和個人一樣，都受合約的約束。

新罕什爾於受挫之後，乃於一八二一年對州內銀行資金課稅，意欲運用此項稅收創辦州立大學。但大學終究沒有建成。而在一八二八年，這些款項乃撥歸地方政府，做為「輔助和維持免費學校，或其他教育目的之用。」每個鄉鎮都把該款項併入學校經費，而在彼得堡洛則例外。在該地，地方人士於一八三三年四月九日集會決議，將該款項（通稱為文藝基金）的一部分保留為興建圖書館之用。翌年，圖書館成立，且每年獲得地方人士的支持。因此，彼得堡洛乃聲稱他們擁有第一個真正公共圖書館的榮銜。因為他們在沒有任何捐贈情狀下興建了圖書館，而且連續不綴加以支持，時至今日不啻中斷。諸位可以自作決定，那一邊的聲明比較有力。為保留歷史紀錄，我們應該提一提一八二七年麻州勒新頓（

Lexington) 的地方集會，決議撥款六十元創建少年圖書館，而且以後續有撥款。圖書放在市民會議廳裏，到一八三九年，因為支持時續時綴，不敷維持，圖書館終告消失。我們必須注意，所有這些市鎮都很小，而他們的圖書蒐藏也不比中世紀圖書館大多少。公共圖書館運動極需要的，是一個大而具影響力的都市來支持它。這個機會終於在該世紀中葉來到波士頓。

波士頓公共圖書館 (Boston Public Library) 可以說在一八四一年即已誕生。當時一位法國奇人亞歷山得·維特莫·M·維特莫 (Alexandre Vattemare. M. Vattemare) 對波士頓市民演說，闡釋公共圖書館課題，以及政府文獻的國際交換對促進國際和平和瞭解的重要性，他本人大半生則以腹語術專家M·亞歷山得 (M. Alexandre) 而自居。當他從舞臺退休之後，乃轉移興趣於世界各國間文獻的交換活動，這也是他到波士頓來的主要原因。開始時，波士頓對他的想法不知如何是好是否應該認真考慮，或當它是一回江湖表演。無論如何，由於維特莫的努力，波士頓於一八四七年接到巴黎贈送的文獻。波士頓領受了贈件，次年市議會申請並經州議會授權，興建公共圖書館。但一直到一八五二年，市議會才撥款。當時市長錫維 (Seaver) 指派了包括喬治·帖克諾和艾德華·艾弗烈特在內的特別委員會，做一項計劃研究報告。這項報告，幾乎全是艾弗烈特和帖克諾的努力成果，於一八五二年呈送，而圖書館則於一八五四年正式開放。受到波士頓這個例子的鼓舞，其他市鎮也開始興建公共圖書館。一八四九年，新罕什爾州通過立法，准許州內各地方興建圖書館，此或許又是維特莫第二次訪美的影響。麻州也於一八五一年制定了類似的條款。

南北戰爭的爆發和其後南部各州重建期間，顯然的公共圖書館的發展遭到了阻礙。但到了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由於安卓魯·卡內基 (Andrew Carnegie) 的捐助，公共圖書館在全國各地迅速蔓延成長。我們年青時所熟知的卡內基圖書館，在各地興建，只要地方上同意繼續支持。雖則當卡內基將他的財力提供運用時公共圖書館有如旭日初昇，但我們不禁要發問，假如這位幼時在他祖國求書不可得的蘇格蘭人，未在鋼鐵業致富，則圖書館的發展又將如何。安卓魯·卡內基所發起的工作，續由紐約卡內基法人 (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和其他有關圖書館發展的基金會繼續推行，諸如洛克菲勒基金會 (Rockefeller Foundation)，福特基金會下的圖書資料委員會 (Council on Library Resources)，以及其他一些資金較小的機構。過去三、四十年來，聯邦政府對圖書館的輔助，大都經由美國教育司 (U. S. Office of Education)，國家科學基金會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國家健康署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有時則經由各種不同的委員會。無論如何，對圖書館大量捐助的時期似已成過去。如今，補助款項通常偏重於鼓勵研究，輔助教育，以及圖書館研究的獎助學金。雖然如此，在圖書館服

務和建設法案 (Library Services and Construction Act) 下，過去仍有圖書館，尤其是公共圖書館，得以擴充其分館系統和其他圖書館設備。巨資——其來源為個人，團體，抑或政府機關——獎助時期在歷史上遺下了標誌，名字諸如摩根 (Morgan)，罕廷頓 (Huntington)，柯雷勒 (Crerar)，弗吉爾 (Folger)，以及普拉特 (Pratt) 等均名垂美國圖書館史上。

以上為幾百年來圖書館歷史的大綱；它對今日圖書館和圖書館員事業的意義，將見於以後諸章。

附註：

- ① J. Russell Smith, *North Americ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25), p.3.
- ② H. J. de Vleeschauwer and H. Curtis Wright, "Origins of the Mouseion of Alexandria," in *Toward a Theory of Librarianship: Papers in Honor of Jesse Hawk Shera*, Conrad H. Rawski, ed. (Metuchen, N. J.: Scarecrow Press, 1972). p.90.
- ③ Quoted by Alfred Hessel in *A History of Libraries* (Metuchen, N.J.: Scarecrow Press, 195), p.86.
- ④ Quoted by Van Wyck Brooks in *The Flowering of New England* (New York: Dutton, 1937), p.121.